

# 从“第二重矛盾”到“代谢断裂”：奥康纳与福斯特生态思想的传承与分野

陈楠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 围绕詹姆斯·奥康纳“第二重矛盾”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代谢断裂”两种生态马克思主义核心范式的比较，对于理解当代生态危机的理论根源具有关键意义。奥康纳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出发，将生态危机界定为资本积累与自然条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并强调社会运动与制度调适的可能性；福斯特则通过重释马克思“新陈代谢”概念，揭示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与自然物质交换的历史机制，指向对资本逻辑的根本性超越。二者在理论根基、危机机制与实践路径上既呈现分野又形成互补，共同构成生态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代生态困境的重要理论框架。

**关键词** 奥康纳；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

**Abstract** Comparing James O'Connor's "Second Contradiction" with John Bellamy Foster's "Metabolic Rift"—two core paradigms of ecological Marxism—holds critical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heoretic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rises. O'Connor, starting from capitalist production conditions, defines the ecological crisis as a structural conflict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natural conditions, emphasizing the potential for social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Foster, by reinterpreting Marx's concept of "metabolism," reveals the historic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apitalism disrupts the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pointing toward a fundamental transcendence of capitalist logic. While diverging 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crisis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the two approach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jointly constituting an essenti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cological Marxism to interpret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predicaments.

**Keywords** O'Connor; Foster;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etical Comparison

Received: January 26, 2026

Revised: February 15, 2026

Accepted: March 1, 2026

Published: March 7,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 1. 引言

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驱动下，生态环境恶化已从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危机。资本逻辑对自然资源的无度掠夺与商品化，导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污染扩散等危机加速累积，其破坏程度远超生态系统再生能力。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尤为尖锐，形成“生态剥削”的不公。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生态危机背景下的重要发展方向，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审视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并探索实现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正义相统一的路径。在这一理论流派中，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作为两位代表性人物，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化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奥康纳强调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积累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冲突，他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而福斯特则聚焦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概念，试图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中挖掘生态思想的根基，即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本身具有系统的生态思想，他的理论体现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色彩。两者的理论出发点、分析框架以及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反映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多元化特征，也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维视角。

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分歧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张乐和郭佳(2023)指出，奥康纳力图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福斯特则重释马克思经典，他们在危机溯源、理论核心和解决路径上虽同属一流派，但存在显著的思想交锋<sup>[1]</sup>。张立平和徐春艳(2013)指出，奥康纳代表第一阶段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社会运动和生产条件的分析，而福斯特则代表第二阶段，强调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深化<sup>[2]</sup>。欧阳光明和何山青(2018)进一步探讨了两者的差异，认为奥康纳关注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而福斯特更聚焦于生态问题的自然科学依据<sup>[3]</sup>。这些研究表明，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理论虽有差异，但也从不同层面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二者理论的差异可以深入各自理论进行探讨。

在既有研究多从思想史梳理或一般性比较出发的基础上，仍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被充分澄清：奥康纳与福斯特同属生态马克思主义谱系，其理论为何在危机根源与实践路径上呈现明显差异？换言之，“第二重矛盾”与“代谢断裂”究竟只是解释层面的差别，还是体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根本分歧？若二者分歧涉及对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生态思想地

---

位以及社会变革方式的不同理解，那么这种差异本身即构成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重要思想张力。

由此，本文拟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奥康纳与福斯特在生态危机生成机制上的理论分歧何在；第二，这种分歧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制度改良路径”与“制度超越路径”之间怎样的理论张力；第三，对两种理论的比较能为当代生态批判理论的建构提供何种方法论启示与规范性方向。通过对二者理论结构、问题意识与实践指向的系统比较，力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差异中揭示其理论发展逻辑，并为理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 2. 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

詹姆斯·奥康纳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在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了“第二重矛盾”理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析为核心。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经典危机理论的创造性拓展，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关系深刻剖析的产物。

### 2.1. “第二重矛盾”理论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通过生产过剩和阶级斗争表现出来<sup>[4]</sup>。而奥康纳则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不仅在社会内部孕育矛盾，还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埋下了另一重危机根源——“第二重矛盾”——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过度掠夺与破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sup>[5]</sup>。这种矛盾源于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无尽追求，导致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受到威胁。奥康纳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而解决之道则需要通过社会运动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来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重正义。他的理论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注入了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强调生态问题与社会不平等的交织性。

奥康纳的核心论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资源视为无限可得的“免费礼物”，其内在的利润驱动逻辑促使资本家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这种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不仅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也反过来威胁到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会推高生产成本、削弱利润率，从而动摇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因此，“第二重矛盾”揭示了生

---

态问题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联，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多重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奥康纳并未将“第二重矛盾”简单视为生态危机的外在表现，而是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分析之中。他继承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批判视角，认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社会经济矛盾的外化。这种理论创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也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 2.2. 生产条件的危机与生态破坏

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源于其对自然条件的掠夺性使用，这种矛盾不仅威胁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同时也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削弱了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sup>[5]</sup>。”奥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分为三类：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并指出“第二重矛盾”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与资本积累的冲突上。他提出：“自然资源被资本主义视为‘免费礼物’，其有限性和再生性被忽视，导致资本积累与自然条件之间的冲突成为系统性危机的根源<sup>[5]</sup>。”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然资源被转化为商品，成为资本增值的基础。然而，这种转化过程伴随着对自然再生能力的忽视与破坏。森林砍伐、矿产过度开采和水资源污染不仅耗尽了自然资本，也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奥康纳认为，这种对生产条件的破坏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逻辑的必然结果。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聚焦于劳动剥削不同，奥康纳的分析将自然资源的掠夺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资本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不仅表现为资源的物理性枯竭，还通过生态退化间接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空气污染和水质恶化会损害劳动者的健康，增加社会再生产的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剧资本积累的危机。这种生态与社会的双重剥削揭示了“第二重矛盾”的复杂性：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更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化。

从学理角度看，奥康纳的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危机分析的单一维度，将生态因素纳入资本主义的动态运行之中。他强调生态危机并非独立于经济过程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系统性视角为理解当代环境问题提供了深刻洞见，同时也提示我们，单纯的技术性解决方案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第二重矛盾”。

## 2.3. 生态运动与社会变革的路径

---

奥康纳的理论不仅停留在批判层面，还提出了通过社会运动应对“第二重矛盾”的实践路径。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的合理性为基础，其目标是满足人类需求而非利润最大化，这要求通过社会运动联合工人阶级与环保力量，共同挑战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sup>[5]</sup>。”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以生产的合理性为基础，其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他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产物，因此解决之道必须超越表面的环境保护，转向对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奥还主张生态运动应与工人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等社会正义运动相融合，形成一股合力，挑战资本主义的霸权逻辑。他还提出通过国家民主化协调资本与自然的关系，认为民主化的政府可以制定政策，限制资本对自然的破坏。

在这一过程中，奥康纳特别强调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仅针对劳动者，也针对自然环境，二者共同构成了被压迫的对象。因此，生态运动的目标不应仅限于恢复自然生态，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兼顾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的新型社会秩序。这种双重正义的追求体现了奥康纳理论的规范性维度，也为其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奥主张通过“新社会运动”（如环保运动、女权运动）与劳工运动结合，推动资本主义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并且提出“生产正义”替代“分配正义”，强调以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为导向，限制资本对自然的剥削。总体来看，奥对生态危机的破解路径还是依赖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改良，并未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终究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兜圈子。

## 2.4. 理论的贡献与反思

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结构性关联，也通过社会运动的视角为危机应对提供了方向。这一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于其跨学科性：它将生态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相结合，打破了学科壁垒，为分析当代复合型危机提供了综合框架。

当然，奥康纳的构想并非无懈可击。奥康纳对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分析较为深入，但对文化、技术等非经济因素的关注不足。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技术进步的生态影响同样在加剧“第二重矛盾”，却未被充分纳入其框架。他的方案有些过于抽象，依赖社会运动的自发性，却未给出清晰的路线图；他对消费主义的忽视，也让理论少了些现实抓地力；他的方案未彻底超越资本主义框架，试图在现有体系内寻求改良，这导致理论的不彻底性。这些问

---

题提示我们，“第二重矛盾”的解决需要更具体的策略设计，而非仅依赖理论上的运动号召。

### 3. 福斯特的“代谢断裂”理论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与詹姆斯·奥康纳相比，福斯特的理论体现出更加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其“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理论以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为核心，旨在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本中挖掘生态批判的潜力，认为改良无法解决根本矛盾。他的核心理论观点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产物，只有消灭资本主义逻辑才能消除危机。

#### 3.1. “新陈代谢”概念与理论根基

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更注重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取生态维度。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提出，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描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这一关系通过劳动得以实现，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断了这一自然循环，导致“代谢断裂”，即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sup>[6]</sup>。福斯特主张，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非外加的假设，而是其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解读，试图重建一种基于生态与社会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并以此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非可持续性发展模式。福斯特的理论不仅深化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也为其提供了更强的历史依据。

福斯特的理论创新在于，他将“新陈代谢”从生物学隐喻提升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分析工具。他认为，马克思早已关注到资本主义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如土壤肥力的下降和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些现象在当代表现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细致解读，论证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合法性，同时为其注入了科学性与学理性。

#### 3.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断裂

福斯特提到：“资本主义农业通过化肥和农药的滥用中断了土壤的自然循环，工业则通过污染和资源掠夺切断了城市与乡村的养分回流，这种断裂是生态危机的物质基础<sup>[6]</sup>。”福斯特指出，“代谢断裂”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逻辑。在这一逻辑下，自然被商品化，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而非可持续再生的生态系统。资本主义农业通过化肥和农药的滥

---

用破坏了土壤的自然循环，导致土地退化和生态承载力的下降。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了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与奥康纳关注生产条件的视角不同，福斯特更强调生态过程的物质性维度。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掠夺自然资源，还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代谢循环。城市废弃物的无序排放切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养分回流，形成一种不可逆的生态断裂。这种分析赋予了“代谢断裂”理论鲜明的自然科学色彩，使其在解释生态危机的机制时更具说服力。

福斯特的理论提示我们，“代谢断裂”不仅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已从局部扩展到全球，表现为碳排放的跨境影响和资源的跨国掠夺。这种时空尺度的拓展为理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从历史层面看，“代谢断裂”首先表现为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中断。传统农业社会中，粮食由乡村进入城市消费，其产生的有机废弃物又通过肥料形式回归土地，形成相对稳定的养分循环。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城市化将人口与消费集中于城市，排泄物与生活废弃物不再回归农田，而以污染形式排入河流与海洋，导致一方面城市环境恶化，另一方面土地肥力下降并依赖化肥补偿。这种“养分单向流动”使自然循环被社会空间结构所切断，构成代谢断裂的典型历史形态。

在当代表现上，代谢断裂已扩展为全球尺度的生态失衡。以碳循环为例，化石能源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燃烧，将长期封存于地质结构中的碳重新释放至大气系统，使自然吸收能力难以在同一时间尺度内完成再平衡，形成持续累积的温室效应。与此同时，资源开采与废弃排放在空间上的分离，使生产地、消费地与污染承受地彼此分离：资源多来自全球南方，而环境代价往往由特定地区承担。这表明代谢断裂不只是自然过程被破坏，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空间扩张与时间压缩重构自然循环，使社会代谢与自然代谢发生系统性脱节。

由此，“代谢断裂”并非单一环境问题，而是一种由生产方式组织形式所造成的物质交换结构性扭曲，其核心在于资本积累逻辑对自然循环节律的持续突破。

### **3.3. 重建代谢关系的可能性与设想**

福斯特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的生态破坏，还提出了重建人类与自然代谢关系的愿景。他援引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主张在超越资本主义的

---

社会形态中，生产将以满足人类需求和保护生态为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利润。福斯特还主张通过政治、文化、战略层面的全面生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他强调生态正义需以消灭资本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和解。这一愿景将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正义相结合，体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追求。

### 3.4. 理论的意义与局限

福斯特的“代谢断裂”理论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挖掘，为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其将自然科学的物质循环概念与社会批判相结合，展现了高度的学术原创性。同时，理论对农业、工业等具体领域的分析增强了其解释力，使之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有力工具。

然而，理论也存在不足。首先，福斯特过于依赖马克思的历史文本，未能充分融入当代生态科学的最新进展。比如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超出了“代谢断裂”概念的解释范围，需要更广泛的理论整合。其次，理论的实践指导性较弱，如何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实中修复代谢关系，仍需更具体的政策建议，福斯特的解决方案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何在实践中修复“代谢断裂”仍是一个难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乌托邦色彩。

## 4. 奥康纳与福斯特理论的传承与分野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在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时展现了强大的解释力与批判力。奥康纳和福斯特的理论既是传承继承而来的，却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均在生态维度上进行了创新性拓展。二者的理论在某些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但亦体现出各自的特点。隋秀英(2018)比较了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前者强调“第二重矛盾”，后者聚焦“新陈代谢断裂”，两者均批判资本主义，并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构想<sup>[7]</sup>。

### 4.1. 理论传承：共同的方法论根基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化

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理论均植根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议题上的当代演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第一重矛盾”通过生产过剩和阶级斗争显现<sup>[4]</sup>。奥康纳与福斯特在此基础上，将生态危机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分别提出了“第二重矛盾”和“代谢断裂”理论，丰富了危机理论的内涵。

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社会内部产生矛盾，还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孕育了另一重危机，即资本积累对自然条件的过度掠夺。他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产物，与经济危机相伴

而生。这种观点继承了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批判视角，并通过生态因素的引入，扩展了危机的分析维度。福斯特的“代谢断裂”理论则从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出发，强调资本主义中断了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他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挖掘，论证了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并为其理论赋予了科学性和哲学深度。

两位思想家均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生态危机归结为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夏劲和蔡丽丽（2015）指出“奥康纳和福斯特都揭露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认为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sup>[8]</sup>。”奥康纳关注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耗竭，福斯特则聚焦于物质代谢的中断，二者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剥削。这种生态化的理论拓展，不仅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还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复合型危机提供了新工具。

尽管奥康纳与福斯特在理论路径上呈现出明显差异，但二者能够构成同一讨论对象的前提，在于其共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立场。两人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出发点，将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种由物质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关系结构，并坚持危机必须从制度内部矛盾中得到解释，而非归因于偶然的技术失误或道德偏差。在这一方法论框架中，生态问题不再被视为外在于社会的自然事件，而被纳入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

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主要围绕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展开，揭示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化之间的结构冲突。奥康纳与福斯特的共同理论推进，正是在不否定这一核心矛盾的前提下，将“自然”引入资本主义矛盾结构内部，使其成为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构成性要素。换言之，生态问题由此从资本主义运行的外部条件，转化为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本身的表现形式，危机理论的解释范围因此发生根本扩展。

在这一共同理论操作中，二者分别通过不同概念路径完成同一理论任务：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破坏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奥康纳通过“生产条件”范畴，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进入资本积累结构之中；福斯特则借助“新陈代谢”范畴，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纳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二者虽然概念工具不同，但都将生态问题从资源管理或环境伦理问题转化为生产方式问题，从而确立生态维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结构性地位。

因此，所谓理论传承，并非结论一致，而是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的一致：二人都以资本主义再生产逻辑为分析中心，将生态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历史展开形式。正是这一共同理论根基，使“第二重矛盾”与“代谢断裂”

---

的差异成为同一理论坐标中的不同展开，而非彼此无关的解释体系，也为后文比较二者理论分野提供了可比性的前提。

## 4.2. 理论分野：视角与方法的差异

尽管奥康纳与福斯特共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二者在分析视角和方法论上存在显著分野，反映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多样性。张风帆（2019）通过比较指出，奥康纳侧重第二重矛盾，分析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间的不平衡。福斯特则立足马克思文本，阐释新陈代谢断裂，批判资本主义异化<sup>[9]</sup>。石晨（2020）则聚焦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理论交锋，指出因范式与重点差异，他们在马克思与生态关系、生态批判内容及运动理论基础等核心问题上，展现了对话与争鸣<sup>[10]</sup>。

奥康纳采用宏观的社会经济视角，将生态危机嵌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框架。他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社会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产物。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往往伴随着对边缘群体的剥削，二者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图景。这种视角强调生态危机与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系统性互动，展现了综合分析的广度。福斯特则倾向于微观的物质循环视角，聚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代谢的破坏。他以农业为例，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单一化种植和化肥滥用中断了土壤的自然循环，导致生态退化。这种视角依托自然科学的物质性基础，注重危机发生的具体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深度。两者的视角差异反映了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过程的不同切入点。

奥康纳的方法论偏向社会实践，他强调生态危机需通过社会运动解决。在他看来，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密不可分，生态运动应联合工人运动、反资本主义斗争，形成对抗资本霸权的合力。这种方法赋予理论强烈的实践导向，试图在现实中推动变革。福斯特的方法论则更注重理论建构与哲学溯源。他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试图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福斯特认为，理解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揭示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而非仅依赖社会运动的外部推动。这种方法突出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与学术严谨性。

整体来看，奥康纳认为马克思本人没有具体生态观念，但福斯特却主张马克思在其理论中体现出了生态思想。奥康纳的理论体现出“非正统性”，其理论因否定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而被批评为“修正主义”，而福斯特通过文本挖掘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正统性”。张乐民（2014）总结指出，福斯特和奥康纳研究理路根本不同，其争论焦点

---

在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涵、资本主义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生态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战略<sup>[11]</sup>。

### 4.3. 理论互补：多维度下的生态马克思主义

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理论虽有分野，但并非对立，而是从不同层面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互补关系。

奥康纳的宏观视角提供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整体运行的系统性关联，而福斯特的微观视角则揭示了危机发生的具体物质机制。奥康纳的社会实践导向为生态运动提供了行动指南，而福斯特的理论深化则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根基。在气候变化抗争中，奥康纳的理论激励社会动员，福斯特的理论则提供科学依据与哲学支持。二者的互补推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与理论上的双重发展。

### 4.4. 理论创新：超越传统框架

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理论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展现了超越传统的创新性。

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的单一关注，将生态维度融入资本主义的动态分析。他提出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强化，如环境退化如何加剧生产成本上升，反过来推动资本进一步掠夺自然。这种复合危机观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颖框架。此外，他对社会运动的重视也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实践路径。

福斯特的“代谢断裂”理论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新阐释，赋予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哲学根基。他将自然科学的物质循环概念与社会批判结合，如分析工业化如何破坏生态平衡，展现了理论的跨学科原创性。这种方法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还增强了其对具体现象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奥康纳与福斯特的理论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第二重矛盾”和“代谢断裂”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二者既有视角与方法上的分野，又在宏观与微观、实践与理论上互补共生，共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 5. 结论

通过对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理论与福斯特“代谢断裂”理论的系统比较，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核心结论：二者的分歧并不主要表现为是否承认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而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奥康纳

将生态危机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被破坏所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其理论仍以内在调适与制度改良的可能性为前提；福斯特则将生态危机界定为社会代谢关系被资本逻辑根本性扭曲的历史结果，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超越。因此，两种理论分别代表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体系内矛盾深化”与“体系性断裂”两种解释范式：前者强调危机的经济—社会再生产机制，后者强调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关系的历史断裂机制。

正是在这一差异基础上，二者形成互补关系。奥康纳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与现实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使生态批判具有制度分析与实践导向；福斯特则通过重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将生态问题提升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维度，使生态批判具有哲学深度与范式意义。前者增强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后者强化理论的基础合法性，共同构成生态马克思主义由社会批判走向文明批判的理论推进过程。

从思想史角度看，奥康纳标志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由“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阶段进入系统化危机理论阶段，而福斯特则推动其转向“社会—自然关系范式”的理论重构阶段。前者完成了将生态问题纳入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工作，后者则完成了将生态维度内在化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构的工作。二者并非简单的前后替代关系，而构成理论深化链条：生态问题先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矛盾的表现形式，继而被确立为资本主义存在方式本身的问题。

由此可回应引言提出的研究问题：奥康纳与福斯特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将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可调适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分歧反映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改良路径”与“超越路径”的理论张力；而比较二者的理论意义，则在于揭示生态批判既需要制度分析层面的现实解释能力，也需要社会存在论层面的范式基础。只有在机制批判与存在论批判的统一中，生态马克思主义才能形成既具现实指向又具理论深度的批判框架。

## 参考文献

- [1] 张乐,郭佳.奥康纳与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比较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04):136-139.
  - [2] 张立平,徐春艳.论奥康纳和福斯特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分歧[J].求索,2013,(09):239-241.
  - [3] 欧阳光明,何山青.奥康纳与福斯特:谁是真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04):28-34.
-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18.
- [5] 奥康纳.唐正东.臧佩洪.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 福斯特.刘仁.肖峰.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7] 隋秀英.奥康纳与福斯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04):55-60.
- [8] 夏劲,蔡丽丽.奥康纳的双重危机论与福斯特的物质变换裂缝论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09):87-93.
- [9] 张风帆.詹姆斯·奥康纳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比较研究[J].兰州学刊,2019,(11):20-31.
- [10] 石晨.对话与争鸣:福斯特与奥康纳的理论交锋[J].学术探索,2020,(02):19-24.
- [11] 张乐民.福斯特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比较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03):102-106.
-